

漂泊的主體

——評史唯《澳門移工： 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

● 陳如珍

史唯的《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以「澳門移工」為研究對象，既書寫為了工作、薪酬和夢想而離家的移工，也分析了澳門在主權移交與新自由主義擴張的歷史背景下的社會變遷。



史唯：《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

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史唯的《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以下簡稱《澳門移工》，引用只註頁碼）一書以「澳門移工」為研究對象，既書寫為了工作、薪酬和夢想而離家的移工，也分析了澳門在主權移交與新自由主義擴張的歷史背景下的社會變遷。對這兩個議題感興趣的讀者來說，這是一本不容錯過的好書。本書平實易讀，結構清楚，既有社會學科理論的厚度，又有清晰的歷史脈絡的鋪陳。放在移工相關研究的文獻中，本書有個獨樹一格的特點：作者研究的「移工」包含了在澳門社會中各種「非技術類的外來勞動力」（頁3）。書中訪談的對象包括越南籍的家庭助理和保姆，印尼的廚師，中國內地的餐廳服務生和葡文翻譯，尼泊爾籍的保安和護理員，尼日利亞的圖書館助理和產品質檢助理，以及菲律賓籍的酒店員

工、馬場工人和清潔工，等等。把這些跨越不同國籍、族群、性別與工種的群體放在一起分析，凸顯了他們相似的地方：離家的動機、對未來的夢想，以及當下充滿挫折的遭遇。

即使背景南轅北轍，澳門移工卻有着極其相似的經歷。透過受訪者的故事點滴，史唯成功地在字裏行間呈現了社會結構與歷史對主體的形塑力量。史唯稱移工為「漂泊的主體」，她在第一章的結尾提及：「本書正是探討這樣的漂泊的主體身份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即這個群體成為漂泊的主體的過程，以及移工如何確認、回應和反思主流社會所建構的主體位置，從而標示出自己的差異而多元的主體身份」（頁23）。換言之，本書想探究的不僅是在歷史脈絡中經濟與文化力量的拉扯，更是好奇移工群體如何回應這樣的主體形塑。

本書的七個章節，反映了對結構的脈絡與個體的掙扎兩個面向的關照。第一章鋪陳了澳門移工的歷史與當地社會和政經結構的幾個轉折。第二到第四章分別論述了移工政策下的身份流失以及在族群與階級論述中的他者化現象，呼應了結構性的視角，也採用了移工與全球化研究中常見的分析架構。第五到第七章則反過來，分析個體的回應與周旋。第五章解析移工在權力與主體的爭取上，在日常生活細節中採取的戰術。第六和第七章則聚焦於空間和情感兩個面向來討論移工在多重限制下的生存實踐。接下來，筆者將從四個軸線來介紹和思

考本書的論述，最後總結本書帶來的疑問與開啟的探究方向。

一 移工作為發聲的主體

在史唯的《澳門移工》中，筆者以為有一個善良的、帶着惻隱之心的出發點。她在自序中提到一個現象：根據澳門法律，移工懷孕是合約上不允許的。如果嬰兒在澳門出生，既不能留在澳門，也不能被領養。於是，不想失去工作的移工會盡力隱瞞懷孕的情形，然後只能在小孩出生之後拋棄他。這樣的政策如果放在一般人身上，一定會被認為挑戰了人性的底線。但是放在移工身上，卻成了合理的、被默許的狀況。為甚麼政府和社會可以接受這樣的狀況（頁viii）？另外一個同樣讓人於心不忍的例子，在第四章講述移工填補了澳門的階級底層時出現。作者提及因為移工被賦予底層地位，他們除了必須忍受工作強度大、時間長等情況外，也會因為地位的差異而容易成為被監視和不受信任的對象。其中一位受訪者、印尼籍的家庭助理Echa就因為家中布滿監視器，「她必須時刻處在工作狀態中。除了身體的疲累之外，Echa更感受到一種精神的疲累」（頁92）。為甚麼這樣顯然挑戰了人性底線的做法，會被視為是合理的？至此，筆者明白了史唯的出發點：她想要了解這群人的生活狀態，聽見他們的聲音。

本書從一開始，就希望讓處於「移工」這個位置上的人「現身」，

史唯的出發點是想要了解移工的生活狀態，聽見他們的聲音。本書從一開始，就希望讓處於「移工」這個位置上的人「現身」，突破主流的社會學與傳播學移工研究中對結構性問題的關注。

移工、特區政府與跨國資本形成了一種三位一體的共生關係。但三者所扮演的角色並不一樣，移工處於權力結構的最底層，被剝奪了發聲的機會，成為新自由主義市場轉型中唯一被予取予求的一方。

希望這樣的選擇可以突破主流的社會學與傳播學移工研究中對結構性問題的關注：或者探討移工遷入之後造成的社會影響；或者關注如何管理、控制移工（頁14-15）。為達成這個研究目標，史唯選擇以兩類資料為主要分析對象：一是對主流媒體描述移工的語言作出分析；二是以訪談的方式來收集移工的主觀想法。在媒體文本的分析上，史唯與研究中國民工的人類學家杰華（Tamara Jacka）有着類似的發現^①，即不論媒體的報導是着重於描述移工對社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治安、資源爭奪等）或是同情移工的經歷，這些文本往往將移工定型，創造出一個道德標準低下或是急需幫助的形象。用史唯的話來說，兩者同樣將移工鎖在一個「弱勢的主體位置」（頁21）。也就是說，移工是被討論的對象而非發聲的主體。

為了讓移工發聲，史唯採用了質性研究常用的深度訪談，在鬧市街頭與移工進行隨機的、一次性的採訪。她從2012年開始一共訪問了十位僱主和106位移工（頁xi）。從第二到第七章開頭引用的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對話，可以約略看出研究團隊採用的是半結構式的訪談；訪談的問題至少包括：為甚麼來澳門，經歷甚麼樣的困難或挑戰，是否被公平對待，有沒有想過要反抗或爭取，對居住、工作和城市空間的感覺如何，在工作中如何處理自己的情緒等。

透過這些提問，作者確認了跨越不同國籍、族群、性別和工種的移工的離鄉動機不外乎兩大類：或

者是為了家人更好的未來而犧牲自己（進入漂泊的狀態）；或者是對於富裕國家物質生活的想像而勇於追夢。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當道的時代，似乎大家對於「美好生活」的想像意外地一致。

二 新自由主義下的移工

除了致力讓移工「現身」之外，本書也對新自由主義作出批評。作者一方面從歷史的爬梳中，說明了新自由主義在澳門如何落地生根，另一方面從移工的各種生存策略、在空間中的廝身，以及情感的規訓，在各個章節呈現出「移工的故事本身，就是新自由主義的故事」這個觀點。

史唯在第一章中對澳門的經濟發展作出精簡的描繪。她首先給出清楚的時間軸：澳門是在二十世紀中期之後才開始透過出口加工成為全球資本市場的一個邊陲（頁4）。然後，在1999年主權移交之後，通過2002年起賭權的開放，吸引大量博彩業外資進入，才快速發展成為一個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一度排名亞洲第一的富裕城市（頁32）。在這樣一個經濟發展的路徑上，澳門曾經兩度因為勞動力不足，需要引進大量的外地僱員。一次是在1970至80年代為了填補出口加工業帶來的勞動力缺口；另外一次則是因應二十一世紀初賭權開放之後，整個城市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職業結構的轉型，帶來對各行各業勞動力的需求。

可以說，這兩次的經濟快速增長，正是澳門新自由主義化的過程。換言之，透過政府的協助、公共資產的私有化、鼓勵資金和人員的跨邊界流動，在達到加速經濟增長的目的同時，澳門也承受着相應的社會結構的改變。作者借用人類學家阿帕杜萊 (Arjun Appadurai) 的全球化理論，指出包含移工在內的大量人口流動的動力，正是由新自由主義的發展理念促成 (頁9)。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特別是在賭權開放造就的「新澳門」中，移工、特區政府與跨國資本在改變現狀、渴望發展、對於更加豐厚的回報的初始點上，形成了一種三位一體的共生關係。但是三者所扮演的角色並不一樣，移工處於權力結構的最底層，被剝奪了發聲的機會，成為新自由主義市場轉型中唯一被予取予求的一方 (頁13)，同時喪失作為一個當代的主體很重要的公民身份。

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學者如哈維 (David Harvey) 和薩森 (Saskia Sassen) 等，都曾對全球資本主義之下的國家角色提出論述，認為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城市和國家的角色並沒有被跨國資本取代，而是和資本家合作，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甚至在新自由主義的實踐過程中被進一步保護 (頁41)。國家角色之所以能夠被強化，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掌控了對遷徙人群的公民身份的操弄。史唯在第二章中對這一點有精彩的論述。

移工不被全然賦予公民身份是由輸出國與輸入國的管治技術聯手打造的情況。作者以「由公民到商

品」和「用過即棄」來描述輸出國與輸入國對移工的管治模式 (頁35、41)。對於輸出國而言，海外的工作機會成為減低國內失業率和增加收入的便捷方法。要讓這個方法行之有效，輸出國政府就必須擁有有效的公民管理技術，讓去海外謀生的勞工群體不要或是不能放棄原有的國籍，成為別國的公民。史唯這一個「母國政府並不希望移工脫離母國國籍」的論述，雖然不能說是一個全新的想法，但是她的鋪陳清楚簡潔，讓這個論點顯得特別有力。另一方面，澳門作為一個外地僱工的輸入地，在政策上有一個特殊的安排：即有非常寬鬆的入境政策，為移工提供方便尋找僱主的機會；又有非常嚴苛的離境政策，移工一旦失去工作機會，必須在十天內離境。這樣的做法一方面給澳門的勞務市場提供源源不絕的勞動力，另一方面讓輸入地的政府得以卸責，對於促進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移工幾乎不需要負擔任何社會成本，「用過即棄」。

馬克思在對資本與勞工薪酬的論述中，曾提出一個非常震撼人心的觀點：勞工的所得並不反映他們的社會經濟價值，而只是他們維持一個人 (一份勞動力) 的基本生存所需而已^②。史唯的論述，讓筆者聯想到在移工供給充足的新自由主義市場下，對於國家資本而言，不僅是薪資，甚至包括對一份勞動力的養成與維護，都是可以苛扣的。移工在海外工作期間，不論在輸出國或輸入國都不享有完整的公民權，這也就是作者在第二章中所說

作者以「由公民到商品」和「用過即棄」來描述輸出國與輸入國對移工的管治模式。而移工的「半公民」身份，又是全球資本主義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之下，人不僅僅是被動地受到資本與政治操弄的棋子，而是有主體性的，主動選擇並成為這一套生產和價值體系下的「理想人選」。移工來澳門工作本身，就是這一種自我管理的實踐。

的「吊詭的半公民」身份。而這個「半公民」身份，又是全球資本主義運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移工處在這樣一個不利的位置，一方面得不到輸出國和輸入國本應賦予他們的權利，另一方面作為社會底層，又很容易淪為新自由主義市場轉型中各種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頁76）。他們是否曾思考過反抗，努力去為自己與權力的掌控者周旋呢？史唯對移工議題的分析，從頭至尾非常強烈地受法國理論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對權力的論述的影響。她如此闡釋福柯對權力的解析：「現代權力主要不是通過強力的手段自上而下施加的，而是以零星的，經驗的，隱蔽的，持續的，生產的，毛細血管狀的和遍佈無疑的彌散狀態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頁122）不僅權力的施加是零星的、彌散滲透的，反抗也同樣以這樣的形式進行。在第五到第七章中，作者分析的正是移工這種日常的、隱蔽的周旋（下詳）。

史唯提出的一個現象很值得讀者進一步思考。她的研究顯示，即使處於社會底層，「但不少移工並沒有感覺很不適應，反而更多的是習以為常」（頁93），所以反抗或是周旋其實是有限的、曖昧無力的。這究竟是為甚麼呢？關鍵也在於理解福柯提到的新自由主義自我規訓、自我管理的技術。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史唯強調新自由主義不僅僅改變了個人、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更重要的是，國家的治理是透過在主體層次上的「利益、欲望和渴望」來操作的（頁95）。換言之，

在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之下，人不僅僅是被動地受到資本與政治操弄的棋子，而是有主體性的，主動選擇並成為這一套生產和價值體系下的「理想人選」。在這裏「自由」、「自我管理」、「自主性」都成為實現社會支配的技術（頁96）。移工來澳門工作本身，就是這一種自我管理的實踐。

三 澳門的「移工主體性」

除了移工的視角、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之外，本書也書寫了澳門在面對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下的因應與選擇。

首先，澳門從來不是全球化城市，即使在GDP高企與財富快速增長的襯托下，澳門還是全球化之下的一個邊緣城市。澳門也從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佔有政府可觀收入比例的博彩業在回歸前是由政府與特定公司簽約的，其他的公有事業、服務業等也都是壟斷性的專營性質，而非實行市場競爭（頁7-8）；但澳門有成為全球市場一員的企圖，透過推動「賭博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頁11），澳門藉由政策的紅利，允許原有掌握區域性政經權力的家族與全球資本合作，讓澳門在短短的二十年間成功獲得全球市場上一個鮮明的定位。對希望到海外謀求更高的薪資或是嚮往發達城市的物質生活的移工而言，澳門就成了一個合理、可及的選擇。

除了時間短促、路徑選擇非常特殊的澳門經濟發展歷程之外，另

外一個作者論及的特點是澳門族群的多元與相應階層的分明。在第三章中，史唯以「複製葡澳時期殖民者的凝視」來描繪澳門的僱主對於移工的偏見（頁60）。她提出在殖民時期，葡裔的殖民者與作為社會管理菁英的土生葡人，往往只因族群的差異而對人口佔多數的華人帶有偏見。雖然這個狀況在1980年代中後期澳門確定了主權移交之後開始轉變，但這段歷史似乎也合理化了族群及其素質的關聯。當澳門在本世紀初同時經歷政治的急劇改變、賭博資本主義帶來龐大財富，以及移工大量湧入時，澳門居民也需要一套文化想像來看待這個轉變中的城市。在經濟轉型、許多澳門人得以進入賭場工作或從事其他中小企業的工作時，移工的出現填補了澳門社會逐漸消逝的低下階層（頁85），而對於這個新的低下階層的想像就由輸出地、輸入地在全球政治經濟版圖上的位階來定義。當對移工母國的理解是「落後地區」時，移工「甚麼都不會，甚麼都不懂，很難教」就顯得理所當然（頁62-63）。反過來說，一旦認定了移工「甚麼都不會」之後，也就同時認定了移民母國的落後，相應地也就確認了澳門的進步與現代。而這正是經濟轉型中的澳門有待完成的文化想像。

筆者認為，愈是理解澳門的歷史與追求，似乎愈感受到這個城市有着某種「移工主體性」。如果把澳門的政治經濟權貴理解成澳門這個城市實際的掌控者，似乎會看到他們仿如移工一般，充滿對更高的經濟收入或是更美好的生活的想

像，充滿冒險精神。他們雖然沒有透過遷徙去築夢，但是也願意放下原有的社會關係和文化背景，讓資本去主導城市的地景、居民的職業、文化的定位。像移工一樣，這個城市也在捨棄原有的主體性之後，在新自由主義市場中找到一個新的位置。

四 尋覓主體

如果說全書有一個最重要的概念的話，那一定就是「漂泊的主體」了（頁23）。這也是筆者覺得全書着墨最多、對移工生活狀態的反思最為細緻的部分。受到福柯關於權力、治理與主體的論述影響，史唯致力於描述這樣一種主體性的生產——一個不斷在結構的限制下努力協商、周旋的過程。她首先要反駁的，是有關移工是一種被動的、逆來順受的被害者的想像。即使是考慮到新自由主義論述中的「自我管理」和「自由」等自我管理技術，也不能說移工沒有反抗和建立主體性的意圖。

史唯的論述讓筆者聯想到另一位人類學者鄭詩靈在她的著作《為愛而走：南韓的娛樂業移工與美軍》（*On the Move for Love: Migrant Entertainers and the U. S. Military in South Korea*）中對於跨國性工作者的論述。她認為書中描述的在首爾美軍基地附近工作的菲律賓籍性工作者，往往被當成是受虐對象或是跨國人口販賣的犧牲者，但根據她的田野研究，她們其實是「欲望的主體」（*desiring subject*），是為了

如果說全書有一個最重要的概念，那一定就是「漂泊的主體」。這也是全書着墨最多、對移工生活狀態的反思最為細緻的部分。史唯致力於描述這樣一種主體性的生產——一個不斷在結構的限制下努力協商、周旋的過程。

異質空間指的是在真實存在的物理空間中，使用者可以透過某些行為改變空間的既有意涵，從而挑戰鑲嵌於空間中的社會關係。比如有的移工會在自己有限的辦公空間中擺放植物，賦予這個工作空間足夠的個人親密性。

有所追求的目標才踏上遷移的路途^③。這一點和史唯的「漂泊的主體」有異曲同工之處。

史唯在全書的結語中提到，「移工的遷移不僅僅只是身體的移動，同時也是移工這個主體的身份認同被重新形構和改寫」(頁192)。換言之，對於移工而言，重新去尋覓主體性，是一個遷移之後不得不做的功課，而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選擇。不得不做，一方面是因為如前所述，在成為移工之後，他們在母國與輸入國的聯手管制政策之下成了「吊詭的半公民」，只能重新為自己尋覓身份；另一方面是因為如移工研究學者帕倫娜 (Rhacel S. Parreñas) 所強調，移動的軌迹除了公民身份之外，也會造成各種包含親職、階級、社群等不同身份的錯置(頁34)。比如，移工在遠赴海外工作之後，雖然獲得較高的收入，但卻同時經歷社會地位下降的過程。又如，在社會學者藍佩嘉對台灣的家務工研究中，也提到許多東南亞籍的家務工往往會在「家鄉的女主人」與「客居地的家務工」兩個互相衝突的身份之間擺盪。她們會以「我其實也和我的女主人一樣」(可能有同樣的學歷或是更好的外語能力)來為自己的身份周旋^④。這些錯置的身份需要被重構，移工也就無可避免地進入一個主動尋覓主體性的過程。

史唯在建構「漂泊的主體」的相關討論上，還廣泛引用了人類學家斯科特 (James C. Scott) 的經典概念：「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斯科特以「弱者的武器」來

論述馬來西亞農民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展現出來的鑲嵌於日常生活細節中的抵抗。在這一類的抵抗中，農民並沒有想要挑戰或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而是希望在這個權力結構中去爭取應得的報酬、照顧或是身份。史唯提到，如果只從公民身份或是經濟結構的角度去捕捉移工在客居地的主體性，很容易就會得到一面倒的被剝削、身處底層或是無聲的印象(頁123)。在她的訪談資料中，移工想要通過公開而正面的方式去爭取權利，然後獲得成功的例子幾乎沒有(頁120)。但是如果從類似「弱者的武器」這類日常的、微觀抗爭的實踐去探究，就會發現還是有許多得以運作的空間與努力。為了捕捉這些日常的、滲透式的對抗，史唯在本書的最後兩章中聚焦於空間的使用和主體情感的表達。

在有關空間的論述上，作者借用法國社會學者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的理論來說明空間展現的其實是社會關係；有特定的社會關係，就會有特定的社會空間(頁132)。因此，一方面僱主會透過空間的管控(比如，能不能用客廳、甚麼時間可以洗澡、放假的時候不應該在哪裏出入、是否可以離開宿舍自行選擇居住地等)來規訓移工的身份，成功的管控實現了僱主與移工之間的位階和身份；另一方面移工會透過空間的使用來爭取對這種身份箝制的反抗。對此，史唯採用福柯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 和根納普 (Arnold van Gennep) 的「閹限空間」(liminal space) 兩個概念

來說明移工這些默默的、也許不自覺的日常反抗(頁140、147)。

異質空間指的是在真實存在的物理空間中，使用者可以透過某些行為改變空間的既有意涵，從而挑戰鑲嵌於空間中的社會關係。比如，有的移工會在自己有限的辦公空間中擺放植物，從而賦予這個工作空間足夠的個人親密性；又如，有些移工會在不無趣而漫長的工作之中，偶爾讓自己陷入手機建構的異質空間之中(頁142-43)。

這一段關於異質空間的論述也讓筆者想到今年在「移民工文學獎」的評審工作中接觸到的一篇文章〈澳門的灰姑娘〉^⑤。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澳門酒店任職客房清潔工的菲律賓移工。她在書寫中說到自己從小就對公主的生活有所憧憬，又很希望可以透過自我管理與投資給家人帶來更好的生活，而來到澳門的酒店工作讓她實現了這兩個夢想。雖然每天推着沉重的推車、從事粗重的清潔工作，但是打開每一道房門時，她都幻想着這是另一個城堡的房間，好奇門後會有甚麼不同的風景。她的文字帶着歡樂和開玩笑般的輕鬆感，讓人感受到透過這樣的想像，她如何試圖克服在異鄉從事社會地位不高的體力勞動的挫折感。

就闕限空間而言，史唯則以澳門移工「不是家的家」(boarding house)和他們在休假時習慣使用的公共空間來說明。闕限指的是一種難以被穩定地劃分、歸屬的過渡狀態；而闕限空間就是指這樣的狀態所存在的場域。把「不是家的家」和「假日的公共空間使用」這兩個

闕限空間的例子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看見作者所論述的「移工這個主體的身份認同被重新形構和改寫」的過程。在客居地的「不是家的家」的時光，對史唯的受訪者(特別是家務工)而言，是他們感到最開心的時間。因為離開了工作地點，他們才有可能脫離「家務工」或「保姆」等工作身份；不論是發呆或是睡覺，「不必總是看時間」(頁149)。「不是家的家」給予移工暫時擺脫工作身份的可能性，同時不會把他們帶回母國原有的社會關係和角色。可以說，這一個闕限空間，讓移工暫時脫離各種既有的脈絡，提供一個重新想像身份的可能性。

這種因為脫離了束縛而得以開創不同身份的可能性，讓筆者想到印度學者查爾達(Ipshita Chanda)在她的著作《在城市中尋覓自我：加爾各答單身女性移工的生活》(*Selfing the City: Single Woman Migrants and Their Lives in Kolkata*)中提到的隻身遷移到加爾各答的年輕女性^⑥。雖然作為外地到來的年輕單身女性在這個城市中的生活很艱苦，也要冒上不少風險，但是這些女性說正因為如此，她們才有尋覓自我(selfing)的可能性。

如果說「不是家的家」是一個脫離社會關係的闕限空間，那麼把公共場所私人化、建構異質空間的實踐，就是一種主體再現的過程。筆者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史唯提到的菲律賓籍家庭助理Aileen，她常在放假時和好友在澳門的地標議事亭前地噴水池旁的小廣場上聊天，談談家鄉美味的菜餚等。因此，每次

「不是家的家」給予移工暫時擺脫工作身份的可能性，同時不會把他們帶回母國原有的社會關係和角色。可以說，這一個闕限空間，讓移工暫時脫離各種既有的脈絡，提供一個重新想像身份的可能性。

她想到噴水池這個地點時，這已經不再只是一個澳門的地標，而更像是一個可以連接上她的家鄉的任意門（頁155-56）。充滿菲律賓美食回憶與情感的噴水池廣場，不正反映了一個新的移工主體的社會空間嗎？

以空間為核心的主體性建構，是一種非常安靜的、內隱的過程。相反，透過情感來表達的主體性，則似乎更喧鬧、更外顯。在第七章裏，史唯由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情感結構」出發，論述情感如何不只是屬於個人的，而是與社會的權力密不可分（頁164）。因此，去挑戰情感的規訓，也就有挑戰社會權力與身份建構的意味。這點對於移工而言特別重要。新自由主義在主體的層次上透過「利益、欲望和渴望」來運作個體的「自主性」追求，自然也會牽涉情感的規訓。事實上，因為許多移工從事的是情感的勞動（emotion labor），很多時候「移工必須工具化他們的情感來成為合格的和理想的勞動力」（頁163）。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試圖抵抗工具化，就成了尋覓主體性的一種嘗試。

讀到這裏，讓筆者聯想到在香港參與過的諸多移工假日活動：選美、生日會、慈善募款，還有街拍攝影活動等。在這些活動中，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參與者的情感投入。在為自己創造社群的同時，這些工餘活動提供了機會，讓移工得以創造情感的連結，由去工具化的喜怒哀樂的身體經驗，重新體會到自己的存在。

作者希望讓受訪者從他們的觀點發聲，但訪談得出的內容必然受到訪問者提出的問題左右。這會讓人猜測：為甚麼集中提到空間和情感作為主體建構的焦點？如果由移工來定義的話，除了空間和情感，還會有那些關注點？

五 對本書的反思

前面的幾個小節，筆者試圖以幾個軸線來整合性地介紹本書的主要論點和貢獻。最後，筆者想說說幾個很喜歡和帶有疑義的部分。

首先，筆者的閱讀自然是帶有人類學者的偏見的。必須承認，在閱讀之初筆者對於本書引用的隨機、一次性訪談的資料是有疑慮的（到現在仍有這個疑慮）。作者希望讓受訪者從他們的觀點發聲，但在互相不熟悉的情況之下，訪談得出的內容必然受到訪問者提出的問題左右。這會讓人猜測：為甚麼集中提到空間和情感作為主體建構的焦點？這是不是由研究者提出的角度而不是受訪者共同關注的焦點？在「漂泊的主體」這個重要的議題上，如果由移工來定義的話，除了空間和情感，還會有那些關注點？

雖然有這樣的疑慮，然而讀完全書後，筆者卻佩服研究者對訪談資料的細心體會。如前所述，在新自由主義的布局下，權力的運作和反抗都是在日常的點滴中呈現，這些其實都是難以掌握的信息。但書中有許多敲中研究主題和讓讀者產生共鳴的訪談引用，例如，「可以不是總是看時間」（頁149），或是「其實也沒做甚麼，就是聊天說笑，讓自己開心而已」（頁154）等，卻反映了研究者的敏感度，大大增加了理論論述的可信度和思考的趣味。不論多寡，作者確實做到了不只從宏觀的政治經濟角度分析，而且微觀地傳達出移工群體的聲音。

其次，本書另外一個讓人類學者又愛又恨的部分是理論的引用。這本書非常適合社會科學的入門者，也很適合作為全球化研究或是勞工研究課程的參考書。作者在書中提到了許多相關的經典：比如，霍爾 (Stuart Hall) 有關文化作為社會實踐生產的過程 (頁 18)，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提到的社會決定和主體能動性的關係 (頁 20)，薩義德 (Edward W. Said) 的東方主義 (頁 63)，斯科特和可馬洛夫 (Jean Comaroff) 談論的反抗 (頁 114、122)，德塞圖 (Michel de Certeau) 所講的公共空間 (頁 155)，威廉斯論說的情感 (頁 164)，還有移工研究中帕倫娜和藍佩嘉的專著，當然更不用說貫穿全書的福柯的想法。作者的引用深入淺出，甚至可以說是透過澳門移工的例子，非常清晰地介紹了這些理論。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作為一個人類學讀者，筆者也會想，作者對移工的生活狀態的理解會不會過度受到這些理論的帶領和限制？

再者，本書的結構除了第一章和結語之外，先以三個章節的結構性架構去分析訪談資料，再以三個章節對日常點滴加以領會品味。前面三個章節讀起來整齊有序，氣度恢宏，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後面三個章節，充滿有趣和讓人反覆思考的細節，但也令人覺得似乎陷在了既有的框架中來來回回，沒有明確揭示訪談資料中給出的密碼。筆者很期待作者的後續研究，把這些日常的反抗和情感的資料作進一步分析。

最後，筆者非常喜歡作者以「經歷主體重構的過程之後，他們是否能夠簡單地回到過去、重拾過去的主體身份也可能是一個問題」作為結語 (頁 193)。「漂泊的主體」是一個變動中的主體，也許這不只是一個移工的故事，也是每一個深陷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中的個人的故事。

「漂泊的主體」是一個變動中的主體，也許這不只是一個移工的故事，也是每一個深陷在新自由主義框架中的個人的故事。

註釋

① Tamara Jacka,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② Gayle Rubin,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Women, Clas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A Socialist-Feminist Reader*, ed. Karen V. Hansen and Ilene J. Philipson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74-113.

③ Sealing Cheng, *On the Move for Love: Migrant Entertainers and the U. S. Military in South Korea*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0), 9-10.

④ Pei-Chia Lan, "Crossing Borders and Gender Divides", in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Durham, MD: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5-59.

⑤ Sheena Flor Tamayo: 〈澳門的灰姑娘〉(2019)，移民工文學獎網，<http://tlam.sea.taipei/?p=3525>。

⑥ Ipshtita Chanda, *Selfing the City: Single Woman Migrants and Their Lives in Kolkat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7).

陳如珍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高級講師